

绪 论

一 关于《史记》和中国史学传统

（一 关于传统和史学传统的一般认识

“传统”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及行为方式等。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传统是历史发展继承性的表现，具有某些稳定的素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是不断转化、变动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传统是经历了长时期的积累和演变而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持续性和稳定性，传统一旦形成，就对从古至今的人们和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因此没有时间范围的界限；二是普遍性，对社会各阶层、各个学术领域都会产生影响；三是自觉性，是指继承和遵循传统的自觉意识，自觉意识的出现是传统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传统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四是时代性，人们在继承、发扬传统的过程中，首先要对前人的传统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并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的涵义，同时又在研究的新进展中不断形成新的传统；五是民族性，传统是一

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世代相传的一些思想观念，在具体形成过程中，它是通过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不断提倡和自觉实践而沿传下来的，自是民族性的表现，也是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

通过对史学传统的考察，我们可以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传统的这些特点。我国史学遗产之丰富，是举世公认的，史学传统乃是这个遗产中那些特点最鲜明、传习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分，它主要表现为史学家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①它是以往史家之优良的思想、品德和经验的集中表现形式，也是我国历史传统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从史学传统中看大历史传统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这是我们研究我国史学传统的主要目的和现实意义。

（二）《史记》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

一般认为，司马迁和班固共同影响了我国的史学传统，在历代史家众多的评论中，《史》、《汉》并称也很普遍。从史学发展的整体上来看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提出司马迁来讲中国的史学传统呢？我们要看到，《史记》之为我国史学的奠基之作，首先是在总结和继承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取得的。它在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空前成就，使史学创立之初就具有了相当的高度和鲜明的特征，“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者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达到的成绩就好像是测量器一样可以测量出它们的高低来。司马迁之所以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其秘密就正在于此”^②。可以说，《史记》为史学优良传

此处观点参考瞿林东《传统史学和史学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参见白寿彝《史学史教本初稿》第二篇第一章《司马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89 页。

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一些新传统。其次，较之其他史书，《史记》在思想上的深刻丰富和创新性更突出，也就是章学诚说的“圆而神”。从史家思想的传承看，司马迁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刻。惟其是思想传承，因而更需要依靠具有卓识者，下更深入的功夫，才能把握其真髓。也就是说，它更多地依靠人的力量，在人与人思想的交流中求发展，即司马迁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种精神思想上的交流和传承无疑是推动历史和史学发展的更为关键的内在动力，从而更宜开出更为长久、优良的传统。虽然外在的因素可以暂时地影响或改变史学传统的发展方向，也不可忽视，但史学传统之优良的素质总会在适当的时机喷薄而出，展现出特异的色彩，从而得到更多、更高的阐发。

那么，史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哪些重要条件呢？

第一，就是名家、名著与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关系。

名著、名家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开创一家之言。史学名著和著名史家的思想，往往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总结，是新传统产生的关键环节。名著因其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合理性而能为更多的史家认同，并能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段的史学发展上产生重要影响，进而被广泛继承、发展，积淀为一种民族的传统。著名的史学家大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优良学风，为后来的史家树立了榜样。“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作《史记》的一个明确宗旨，在他之后，很多史家都是在这个宗旨下创造出了很多名著，如刘知几《史通》、杜佑《通典》、章学诚《文史通义》等。此外，有关良史的思想传统、实录的传统、通古今之变的传统，都是由司马迁开出，经由不同历史阶段的史学家在他们的名著中不断阐发，才最终形成和不断丰富的。

第二，史著与史评相互促进。

汉末至隋唐人多喜读《汉书》，研究《汉书》的人较多，东汉人排列名称，往往是《汉书》在前，《史记》在后，主要是因为《史记》在当

时尚触时忌，且文尚骈俪，因此《汉书》的影响似乎超过了《史记》。以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记载自汉末迄于陈，《汉书》注解者凡 25 家。但是，还有一个现象会促使我们寻找更深层的原因。《后汉书·班彪传》记载：“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有好事者颇有缀集时事。”章怀注指明“好事者”为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岑。但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共举 15 人，以为“相次撰续”。东汉班彪续《史记》之前共有 16 家补续《史记》，即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阳城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可见，东汉以前人们对《史记》的研读也形成了一定规模。那么为什么《史记》的史学价值没有像后来那样受重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史记》的史学评论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人们对《史记》的理解首先有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续补过程中不断理解原著。《汉书》出来后，一方面人们对《汉书》的理解也要经历一个续补和研读过程，同时，《汉书》又成为人们研读《史记》的参照物。这样前后相衔促进了人们对《史记》的理解。到晋隋时期人们对《史记》和《汉书》的了解都达到了一定阶段，《史》《汉》比较开始出现评论渐多^①。如班彪、班固、王充、葛洪、张辅、华峤、傅玄、袁宏、刘勰等，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评论，某些论点对后代研究者启示很大。马、班优劣，到晋人才逐渐有定评。同时，司马迁的史才与文才都得到阐发。明、清两代更是评点盛行时期，那时的《史记》研究也是取得成就最多的。明代凌稚隆编《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前者汇集自晋葛洪以来至明 149 家对《史记》的评论；后者亦集东汉荀爽以来各代学者 147 家对《汉书》的评价，其中还有很多涉及《史记》。说明《史记》评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这也是促使凌氏自觉总结史学评论的原因。这些为清代《史记》研究的

参阅〔韩〕朴宰雨《〈史〉《汉》异同研究史略》，见《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绪论》，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兴盛做了思想、方法和材料上的准备。因此，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传统形成和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史家的自觉意识的不断发展。

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本身就是历史遗产和传统的一个载体，历史遗产就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总结我们的史学遗产传统时，实际也在对自身加以总结批判。从这个意义看，传统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不是随个人意志随意处置的身外之物。我们古代的史学家是有这种自觉意识的和使命感的，也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传统的自觉认识，及把传统与自身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加强了他们对史学发展的使命感。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以“承孔子《春秋》”为己任，把自身作为史学传承的历史进程中的一环，这样，史家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实际上就是对史学发展中主观因素的理性要求，也是正确继承历史传统的前提。《庄子·知北游》说：“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某一个时代总是把它喜欢的视为神奇加以追索，反之视为臭腐而加以鄙弃。实际上今之神奇即前之臭腐，今之臭腐或为后之神奇。因此，我们要有把自身视为传承载体的自觉意识和通识，才能让史学传统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二 近 50 年来国内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

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对自身传统的反省和继承。“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①。这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继承关系，传统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中体现连续性的重要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3—704 页

素，是构成每一代人由此出发并有所创新的前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发掘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作为我们史学创新的起点，这是当前历史条件下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还与研究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密切相联。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三次高潮^①。这几次引入西方史学的高潮使中国传统史学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也因此而起，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西方史学的精髓，造就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史学，是时代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本书拟就近 50 年关于史学传统的研究，进而就史学传统研究的前景谈一点肤浅的认识。

（一）中国史学传统研究的基本状况

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部分，近 50 年来对史学传统的研究是从整理史学遗产的工作开始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各学科领域遗产整理工作的逐步展开，史学遗产的整理也开始受到重视。较早提出对史学遗产进行研究的是白寿彝先生。这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白先生所说：“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②在这种情况下，白先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写了一系列关于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文章，论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大意义，而且就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的这些探讨为后来史学遗产与史学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整理研究

① 参见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② 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2 页

工作，白寿彝先生做了持续不断地努力。他的很多见解在今天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2）八九十年代，白先生继续就史学遗产问题发表了“答客问”系列文章，这吸引了很多学者对史学传统问题进行探讨，他们主要是从继承史学遗产的目的出发，就史学传统的内涵作了多方面的发掘和总结，可以说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3）90年代末至今，一方面，先前的研究仍在继续展开，一些野史、笔记、文集集中的史学理论开始受到人们关注，表现出研究者历史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另一方面人们结合时代社会的精神需求，对史学传统的研究开始从内容的总结上升到对民族精神、人文精神的挖掘，并就一些史学传统的内容和现实意义展开讨论，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人们对史学传统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即：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史学传统有哪些具体内容？研究史学传统的意义是什么？

1. 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

由于我国有持续修史的传统，产生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受人瞩目的，因此，很多学者都认为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传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白先生对史学遗产和史学传统的一系列论述。他指出：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我国史学名著多是史家长期积累而成，对有家学传统的史家来说，他们的某些著作还是累代结集起来的成果^①。瞿林东也认为：“中国古代有极丰富的史学，它在3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步培育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②他还专门研究了汉唐史学中的家学传统，指出家学传统在史学继承、史家修养和学术风格方面产生的影响，加深了

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489页。

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我们对史学传统形成原因的认识^①。还有的学者把史学家与史学传统联系起来，认为史学传统是“在古代数千年史学发展中，经过无数史家的探索、总结、继承、发扬而逐渐形成的。它为民族所共识、为历代史家所弘扬，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和进步的学术风范。”^②这些认识无疑都强调了历代史家对修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长期坚持著述的治学精神，这使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弘扬史学传统的使命感，而不仅仅把史学传统的形成看成是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关于史学传统形成过程的认识是我们研究史学传统的前提。

2. 多方面多层次总结史学传统

由于对史学传统认识的出发点不同，人们总结史学传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总结了史学传统的主要内容：

第一，白寿彝先生从我国史学优良传统是史学长期发展积累而成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个传统，后来又发展为七个传统：一是总结过去的得失成败，作为当前做事、做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的借鉴。二是每次大变乱之后，总结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朝建立的借鉴。三是“述往事 思来者”、“神以知来”等是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四是博学的传统。五是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六是重视语言，重视文学造诣。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写战争、表世态。七是把撰史作为不朽之业 历尽艰辛 坚持著史^③。

第二，在此基础上，瞿林东围绕历史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展开论述，进一步将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第二，恢阔的历

瞿林东《试论汉唐史学中的家学传统》，《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瞿林东《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书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第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第四,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第五,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第六,探索理论、讲求文采、重视考据等^①。从而更合理地解释了这些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从时代要求出发,把史学传统作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发掘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如陈其泰的《史学传统与民族精神》^②、瞿林东的《史学传统与人文精神》^③、梁宗华、姜丽红的《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④等。这些研究探讨了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传统、人生修养传统、忧患意识传统和史学审美要求传统等。还有的学者则从历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出发,阐发了历史学精神的内涵,如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求真精神、探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精神、学科方法上的兼容精神、记录人类文化和民族传统的精神、品评历史人物的抑恶扬善精神、与文明共进的时代精神、关怀社会生态的人文精神、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尚智精神^⑤。可以说,这些持续深入的研究都自觉地结合时代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更高意义上挖掘了史学传统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内涵、新价值,推进了当代史学传统的研究。

第四,从史家修养的角度来研究传统也有不少论述。如陶懋炳从器识、学风、文风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器识方面,坚持直书实录,将史学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对历史和史学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在学风方面,“经世致用”的学风持续两千年,代有创新,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勤学不辍、虚怀广师;严肃谨慎、精益求精;批评继承、敢于创新;推诚协作、竭力共事;着眼当

① 瞿林东《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页。

② 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③ 发表于《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

发表于《宁夏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焦润明《论历史学精神》,《光明日报》2000年5月26日C3版

今、详今略古。在文风上，我国古代史家也有三项优良传统：朴实简明，不尚浮华；寓论于史，不尚空言；不拘成规，不求仿古，敢于创新^①。陈干均则总结了古代史家在史学思想方面的三项优良传统：开阔的政治视野、朴素的辩证法和反对专制主义^②。还有学者从古代史家治史的道德品质和学术精神出发，提出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一是惟义之求。古代史家追求的“史义”，主要有“取鉴资治”“彰善瘅恶”“藏往知来”三个方面。二是锲而不舍，即古代史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事业心和锲而不舍的治史精神。三是博学强识。古代史家重视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表现在知识方面，他们都注重“穷涉经史”“博览群书”“博古通今”。在认识能力方面，古代史家不仅注重对史事、史料的鉴别取舍，更注重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撰述能力方面，古代史家极讲究对材料的组织编排和文字表达艺术。四是著述成家，即古代史家的革新进取之精神。五是据事直书。六是言必有征。古代史家对史料的搜集和考信，既注重博览群书，引经据典，也注重社会实践^③。这些研究是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史学“良史”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第五，从“通史家风”的角度，研究我国通史思想传统和撰述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涉及到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和史家修养等几个方面。自司马迁著“通史”提出“通古今之变”“承敝通变”以来，对“通”的论述就多起来。20世纪以来近现代史家编写“通史”的追求促使研究者更加关注“通”的涵义。因此，近50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也是从史学思想和通史编纂方面总结了我国史学“通”的优良传统。如白寿彝先生的《说疏通知远》、《说六通》^④，许凌云的

详见陶懋炳《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详见陈干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详见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详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58页、第285—

《试论“通史家风”》^①、施丁的《说“通”》^②等。这些研究者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发展的角度，把通变思想、通史编纂和通识修养结合起来，从多层面揭示了“通史家风”的形成及其优长所在。当然，还有研究者在对具体的通史著作进行研究时也论及对“通史家风”的认识，如吴怀祺论《通志》的史学批评，认为史家具有“通识”就会带来文化的历史观、内容的丰富性和记述的客观性^③。

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点出发，从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上来论及史学传统。如张岂之将“忧患”意识视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对历史上的忧患意识做了分析，探讨了忧患意识同古代哲学辩证观的关系，认为忧患意识正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④。冯天瑜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依据，试图论证中华元典重史传统与中华民族崇敬先祖的精神之间的联系，认为人文气息浓厚的“敬祖”观念直接发展成深沉的历史意识，开出持续的“重史”传统^⑤。这些作者都运用自己良好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修养，从整理史学理论遗产、继承具有鲜明民族特点文化的角度总结史学传统，对一些史学理论范畴进行了纵向的梳理，并进一步发掘了它们的内涵。还有人把中西史学相比，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一是天人并重的调融性，二是人文精神的一贯性，三是实用理性的涵摄性，四是历史意识的深远性，并认为古代史家的素养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对传统史学方法的提炼是建设新史学方法的依据^⑥。并且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如陈其泰的《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作者着重强调了史学研究的文

发表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详见吴怀祺《“通志”的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详见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详见冯天瑜《中华元典重史传统论略》，《江汉论坛》1993年第8期。

⑥ 详见朱允《试论中国史学传统的断裂与重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化视角和比较方法。这些研究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史学和文化做双向的考察，开拓了我们的思路，提高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思想意识特征和优良传统文化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学科或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总体性的宏观研究有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

3. 对研究传统的意义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总结了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 研究史学遗产 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 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第三 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①。在此基础上，有的文章又有所补充，认为研究史学传统对于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素质，促进新时期史学的改革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也有的学者认为刘·史学传统的考察是为了今天的史学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有新的创造。史学工作者的创新，要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遗产为前提。如陈干均认为：“探讨和吸取古代史学家优良传统的过程，应当也就是史学工作推陈出新的过程。”^③瞿林东认为：“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史研究的新格局；而这种新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史学工作者把握了这种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好地发挥出史学上的创新精神。”^④这些认识对我们理解史学传统与当代史学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①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2—465 页。

② 详见李汉林《中国古代史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吉首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

陈干均《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瞿林东《史学的活力》，见《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二）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

尽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总结了各自对中国史学传统内容的认识，但讨论的热点仍然集中在最主要的几个传统上。

1. 求真的传统

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优秀的历史著作，常被人称为“实录”。求真的思想体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直笔传统，它体现了史家对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实录精神则是人们对史家的崇高评价。司马迁就是史家实录的楷模，“自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①近几十年人们对史学求真原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如刘隆有的《秉笔直书——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②、王天顺的《从“齐史之书崔杼”到“司马迁之述汉非”——试论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早期发展》^③、官伟勋的《直笔与曲笔——我们的史学传统》^④、江渭的《“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⑤、王晓天的《史家直笔刍论》^⑥、谢贵安的《直笔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⑦、刘太祥的《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⑧等等。这些文章分别从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和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对史学求真传统做了深入的阐释。当前研究求真传统不仅是要对古代求真观念的特征和规律给以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2月5日。

发表于《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

发表于《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

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⑥ 发表于《求索》1999年第1期。

⑦ 发表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⑧ 发表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还要探讨求真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含义、新任务，真正揭示出其有价值的地方。

2. 经世的传统

这与求真传统有密切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①；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②。经世传统表现在历史编纂上就是“着眼当代，详今略古”的传统。“注重当今即注重近现代史的研究注重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③。有学者指出“详今略古主要不是资料多寡和搜集的难易，而是由经世致用的宗旨所决定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学领域内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当代史……因而，史家治当代史者往往要冒风险。这是一种应当赞颂的高尚精神”^④。这就为我们揭示出经世不仅是史学研究目的，也体现了一种关注时代需要的精神。史学思想中的借鉴意识、述往思来的意识和忧患意识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历史上，很多史家都明确阐述过自己以史经世的主张。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撰史宗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更大的发展。近年来学术界对史学经世的传统争议较多，如刘信君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嬗变》^⑤、武吉庆的《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⑥、战继发的《传统史学经世功能双重性初探》^⑦和《史义与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发微》^⑧、胡逢祥的《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

① 瞿林东《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② 许凌云《漫谈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陶懋炳《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④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发表于《河北学刊》1995年第1期

⑥ 发表于《求是学刊》1995年第1期。

⑦ 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经世观的批判继承》^①、葛志毅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源流利弊辨析》^②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是对史学与现实、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用进行讨论，有误解，也有辨正。但是总体上人们还是肯定史学经世传统的进步性的，对史学经世传统的核心认识是明确的，即“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为社会服务”^③。在这个问题上，瞿林东的《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 21 世纪而作》^④从分析我国史学上一个传统话题：史学的社会作用入手，在史学与政治统治、“树之风声”、史以“明道”、培养人才、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揭示出史学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新时期的人们正确客观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提供了新思路。这些论述和争议也使我们对于经世传统的形成认识得更为清楚，如一般认为史学经世的思想出现在明清，而现在一些学者明确提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远溯于春秋之末，成熟于明清时期，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始终”^⑤。当今史学的出路就是“继续坚持经世传统，把史学传统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要求相结合”^⑥。

3. 把著史当作不朽之业，历尽艰辛，坚持著史的传统

我国的历史记载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史家把史学看做“名山”事业的优良传统^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其意是把著史当做不朽之业，为此可以生命为代价。正是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对历史

发表于《探索与争鸣》1992 年第 2 期。

发表于《齐鲁学刊》1996 年第 3 期。

施丁《试论史学经世的传统》，《光明日报》1993 年 4 月 12 日。

④ 发表于《史学月刊》2001 年第 1 期。

⑤ 肖季文《谈谈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历史教学》1997 年第 6 期。

⑥ 李元《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北方论丛》1996 年第 2 期。

⑦ 施丁《试谈我国史学的传统问题》，《学术月刊》1980 年第 10 期。

撰述的责任感促成了我国修史传统的形成，而那些丰富生动的史籍就成为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著述传统不再是个人不朽的事业，而是对我们民族繁衍发展历程的自觉记述。

4. 史家才学识三长和史德的修养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关于史家修养的几个重要范畴，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基本上建构了我国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史家修养包括很多方面，上面谈到的博学的传统、善恶必书的传统、批评创新的传统等都构成史家修养的一个方面。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明确提出“史德”认为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主要强调了史家不要以个人好恶影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我们今天不仅要以此为自我修养的准则，还要继续探索如何在现实条件下赋予它以更科学更具有实践意义的内涵。如已有学者强调继承我国古代“良史”的忧患意识传统，如瞿林东的《史学与“良史之忧”》^①、夏乃儒的《中国古代“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②等，这反映了当今历史条件对史家的要求。有的学者针对当前史学和一些历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迷失，发出史魂归来的呼吁^③。史魂即是史德，是强调了史家的人格修养在当代史学中的重要性。

5. 注重文字表述的传统

对史著文字审美要求传统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几部名著的评述上。特别是《史记》把历史学和艺术性的表述巧妙结合起来，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刘知几也曾盛赞《左传》叙事之美。这些关于史著文字审美要求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史学研究

① 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章开沅《论史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的一个重要方面。白寿彝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是把历史文学单独提出加以讨论的，他认为我国的史学家，有不少在历史文学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也有人对历史文学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在历史文学这方面，我们有优良传统可以继承，并且应该发扬。他还认为“历史文学”是史学内容的构成部分，并且从“阅中肆外”与“艺术加工”两方面初步总结了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①这在新时期指导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并且在创作界和学术界引发了对历史文学审美属性的理论探讨。但目前来看，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总结，如历史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关系、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历史叙事理论等。

此外，还有一些传统也在当今的研究中逐渐受到重视：

古代史学民族史撰述的传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白寿彝先生的功绩不可磨灭。他在《中国通史》导论卷中深入发掘了中国史学上重视民族史撰述的传统，总结了自孔子、司马迁以下，史家重视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眼光和对待少数民族问题的理智态度，对两千年来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梳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在对具体史家和史著进行研究时，一些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思想、国家统一思想等，说明这既是历史思想传统的总结，也是撰述传统的总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陈其泰的《史学与民族精神》^②是近年来对史学传统中的民族精神阐发得较为深入的专著。这个传统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下仍需研究，这对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弘扬都是至关重要的。

注重实践，敢于创新的传统。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不仅从历史文献中获得史料，还注重到自然、社会中去寻求历史真迹，丰富历史记载，而且他们都是敢于批判，善于继承，于史书体裁、史实考证或

① 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六章，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学苑出版社 1999 年出版。